



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千里眼順風耳(九)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琅

三校聚集伙食風潮

某日，由灌縣遷來成都臨時借住通校校區的空軍幼年學校學生，因不滿學校的空勤伙食，說伙食辦的太壞，集體抗議逃課，鬧得校長引咎辭職，空軍訓練司令劉牧羣由台灣飛來成都處理善後，通校校長也同機來校，却一文經費沒有帶來，我還臨時向幼校借錢，招待他的食宿，學生們却感情衝動，硬要質問校長，我怕事件擴大，勸阻學生忍耐冷靜，因此他們在校區內，遇到校長時，不但不敬禮，而且怒目相視，使校長氣憤之至，但亦不便發洩。那時成都機械學校、幼年學校和測候訓練班也正在遷移台灣，進度很慢，機校有一位汽車駕駛士，在城內開車違章，被警察誤會，一槍打死，激起了成都汽車駕駛工會的公憤，鬧得滿城風雨，事態嚴重，測候班也因為學

生伙食不濟，常鬧小風潮，學生時有逃亡，唯有通信學校情形比較穩定，官生士兵，雖在極度艱苦環境，仍然大家守秩序，照常操課，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經得起考驗，這是我生平工作上最值得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

有一次南京空軍總部由中央銀行電匯成都通校四千銀元經費，因為南京到成都民航班機停航，銀元無法運來，成都中央銀行又不肯墊出來，可是我們學校需款孔急，官生士兵伙食要錢維持，否則集體鬧飢荒，容易發生意外事端，昆明就發生過搶劫銀行事件，我每次赴銀行，交涉取款，並帶着幾名學生，告訴其負責人實際嚴重情形，軟硬兼施，銀行負責人無可奈何，每次借一些金元券給我急用，因此也維持了一段時間的伙食，以後金元券一天一天貶值，而這四千銀元因為沒有民航班機，始終沒有運來，款退還空軍總部

，至於我向銀行所借的金元券，因為貶值關係，折合不及幾塊銀元，銀行也沒有問通校索還，此外我歷次向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川西供應局和四川省政府等單位所借的金錢和米糧，數目也不少，也因大局逆轉，紊亂時期，一筆糊塗賬，就不了了之，回想起來，頗為有趣。

軍事越來越緊急，學校為減輕運輸噸量，除了人員和十分重要的圖書儀器外，一切財產包括庫房鋼料、汽車、被服傢俱、辦公用品等等，立即就地拍賣，校長起先電報要我主持拍賣事務，這在一般人看來，在此亂時，正是一個混水摸魚大好發財機會，但我因一向對總務經理缺乏經驗，也沒有這個魄力胆量去担当，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人心不好，難免弄出紕漏，將無法洗清白，況且我和校長間，彼此意見隔閡已經很深，應該力避金錢上的糾葛，以防被人抓着弱點陷害暗

算，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經我反復考慮，堅決拒絕接收這一額外使命，最後弄到辭職不幹，由總部人事署長，函告通校校長，請其同意我離開通校，事情無法解決，校長乃改派監察室主任劉沛然和總務處副處長梁康侯，自台灣到成都主持拍賣校產工作，劉沛然是位好好先生正人君子，事事聽校長指使利用，背冤枉，受責難，在所不顧，梁康侯則性喜活動，有一次在成都春熙路大街，和老百姓打起來，惹起地方上公憤，把他所乘坐的中型吉甫車搗毀，自己被拘禁在警察局，待我聞知此事，才把他從警察局保釋出來。

回憶胡宗南王陵基

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冬天某日，西安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昇拍個電報給我，要求就近去太平寺飛機場迎接一位貴賓，我抵達機場，僅見陸軍官校校長關麟徵先我而到，不久，一位身材矮小目光炯炯輕衣小帽從外表看來像是一位文質彬彬的書生，乘着空軍專機由天而降，他就是當年威振西北的西北軍政長官胡宗南，胡將軍告訴我們，他這次純係私人事務來成都華西壩醫院醫治牙疾，行動機密不便驚動成都地方長官，幾天後他來到通信學校訪問，輕車簡從，我們沒有舉行任何接待儀式，他和我聊了半天，他瞭解剿共大局，知道成都軍政當局沒有什麼應變準備，前途不可樂觀，西安也不容易固守，陸軍官校還準備徒步向西康撤退，他建議通校應該加快搬遷速度。在通校遷台灣之初，中央政府機關也在大批

人員眷屬湧向台灣撤退，一時使台灣糧食供應大感恐慌，通校先去台灣的人，有的把家眷便機送返成都，有的在成都買些米麵臘肉火腿去台灣過生活，又據說台灣的雞蛋小，而且吃了會生疥癩，許多人在台灣因為水土不服生病，種種對台灣生活不適應流言，不絕於耳，因此我曾考慮把家眷仍就寄住在成都，自己一人先去台灣，後再作計較，所以在成都城內房子也覓妥了，但玉玲因在抗戰期間，由洛陽逃難到漢口，和我兩地分開，吃够了苦頭，深怕和我再分開，後果難以逆料，所以堅決不肯，好壞死活在一塊，幸好這事沒有做成，否則大陸淪陷後，長期和家眷音訊隔絕，自己孤寡一人在台灣的人多得很，相當淒慘。

農曆元旦，我和機械學校文校長一同赴四川省王主席家拜年，遇到很多四川將領，還有警備司令嚴嘯虎，在他們談話中，認為共產黨並不要麼可恨可怕，甚至還有很多灰色曖昧論調，沒有一個有作戰決心或準備的，證實了胡宗南將軍對我所言，當夜我們就在文校長官舍檢討局勢，和應變措施，在座的還有幼年學校龔校長和軍校航空班彭亞秀等人，我們大家都很憂慮戰況的急劇逆轉，準備萬一撤退不及，必須跟隨着陸軍官校一致徒步行軍轉移，惟有彭亞秀獨持異議，他認為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頗有實力，如果我們投奔劉文輝，他以四川人和友誼關係，可以負責引薦，不但可以保全學校，自己前途更有一番發展，其投機荒唐心理，不值一笑。我們一面要求總部增派運輸飛機加速遷校行動，一面和軍校連繫，準備必要時隨他行動。嗣後聽說成都淪陷後，彭亞

秀是第一個投共的空軍高級軍官，却不久又為共黨所殺。

不敢循私兄妹長別

「兵敗如山倒」國軍屢戰屢北，整個兵團，以數萬之衆，或被包圍或被殲滅，司令官黃伯韜自殺成仁，邱清泉陣亡，杜聿明、黃維被俘，軍師長被俘或陣亡的不計其數，士無鬥志，民心渙散，國共和談空氣相當濃厚，蔣總統因內外交相壓迫，于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引退以冀再戰消兵，解人民于倒懸，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一月廿三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在北平搞「局部和平」，使共軍進駐北平，四月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變節投共，泊駐在長江內河一帶海軍兵艦全部投降，共軍得以無抵抗南渡長江，進駐南京，國民政府先遷廣州，復移台灣。

我們通校遷校的運輸飛機，逐漸也增多了些架次，我全家老小八口和最後一批第十期正科學生，于五月廿三日，由鳳凰山機場赴台灣，在離開成都頭天晚上，胞妹淑貞要求讓她全家包括妹丈周洪濤外甥自強、一平，甥女湘元一心等六人，一同搭乘我的便機飛台，我因他們不是空軍人員，格于規定，不能徇私，況且我在遷移期間，管制搭乘人員，一向嚴格認真，對於自己親屬，尤不敢循情，況我和校長關係搞得惡劣，唯恐有一點徇私舞弊把柄，被他抓住，所以只有硬着心腸拒絕淑貞的要求，不得已她又揀了自己認為最貴重的衣物兩箱，交我帶運台灣，第二天大家在機場揮淚而別，待我到了岡山以後，在成都淪陷前

三天，通校還派了一次運輸機由台飛蓉，我請准了校長同意，准淑貞全家六人由成都搭乘便機來台，但據飛機去成都迎接淑貞的人返回岡山報告我，說他到成都找到了周洪濤家住所，人已先離了家，堂屋裏散放着軍服軍氈或其他衣物，顯然他們已搬家逃往他處，城內已兵荒馬亂，無法詳細打聽，聞悉之下，內心難過失望，終日懊悔不已，輾轉徹夜不能成眠，次日屏東鄧前校長志堅邀約我去他家吃飯，我自駕吉甫車前往，因精神沮喪，情緒惡劣，返回岡山途中，吉甫險些被對面駛來一大卡車撞上，千鈞一髮，幸未肇禍，自此

我與淑妹音訊斷絕，我自我檢討，過份守法守規定，沒有應變魄力，致成終身遺憾，追悔莫及，以後在台灣，每年夏天，我們總要把淑貞兩箱衣物拿出來晒霉，每次見物思人，不免傷心，直到一九七〇年，我僑居美國，還把這些衣物帶往，鄭重保管，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有機會交還她們。

廿三日中午飛機在廣州降落，廣州氣候很熱，我們找個旅館住宿，在機場晤到廣州二軍區司令吳順明和四軍區副司令鄧志堅，他們軍事公務忙得很，打個招呼沒有多談就分手了，他們的家眷早已遷台灣，廣州是中央政府機關撤退大陸最後一個大據點，熱鬧非常，因離香港近，市面上海貨特多，價錢遠比成都便宜，茶樓酒館生意最好，門庭若市，廣州茶點，美味絕倫，名蓋全球，走到世界任何一個都市，都可找到廣東餐館，享受一番中國美味，所謂「吃在廣州」名不虛傳。那時金元券在廣州已不能使用，買賣要硬幣銀元，我買了一部英製自行車，僅十九銀元，還購

了幾件衣料，都很便宜，第二天一大早飛台灣，白雲山整個在望，想當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拋頭顱、灑熱血，為國捐軀，長眠斯土，而今，大好河山，行將變色，愧對先烈忠靈，思之不勝惆悵，早晨的天空氣流，相當惡劣，飛機升降起伏，顛簸不已，母親和妻兒都嘔吐，中午到達岡山機場，教職員和學生們，一大羣來到機場候接我，晚上并為我開了一個歡迎茶會，熱情可感。

岡山通校從頭做起

岡山係台灣南部高雄縣的一個鎮，日治時代，原係航空訓練基地，飛機場學校和眷舍、建築等很具規模，鋼骨水泥的飛機棚廠、教授大樓、眷舍一律日式，可惜在大戰期間，被美國飛機轟炸破壞得很厲害，飛機棚廠僅剩下東歪西倒的鋼架，校區內幾座大樓，也祇是殘牆斷壁，地下室四通八達，適于防空掩蔽，電話電纜埋設在地下，藍圖很清楚，校外眷屬區分官階等級，一切設施，都是永久性的，想日本統治了台灣五十年，把台灣統治得固若金湯，老百姓多講日本話，完全日本化，却沒預料到五十年後，為了不能滿足日本軍閥侵略野心，發動大戰，遭到亡國投降的慘運，台灣仍舊回到祖國懷抱，而我中華民國憑着蔣總統英明領導，堅定的國策和抗戰到底的決心，犧牲了千百萬生命財產，贏得最後勝利，本可從此邁向富強康樂復興大道，無奈共產黨始終在內部作亂，而國民黨軍隊抗戰八年，疲憊厭戰，終致大陸淪沉。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對我國極盡詆譏侮辱，真是落井

下石，十二月李宗仁代總統棄職赴美，溜之大吉，棄國家于不顧，一走了事，荒唐萬分，國家不可一日無元首，全國一致呼請蔣總統復職，重主國政，這是一個國運轉捩點，從此就在台灣這個寶島憑着八百萬軍民的齊心協力，在蔣總統領導下，一切從頭做起，整軍經武，厲兵秣馬，重振旗鼓，屹立于世界，作為反攻復國基地。

通信學校搬來岡山，在物質設備上，當然遺棄損失了不少，好在教官差不多全部跟了學校來，沒有損失，還有幾位在四川大學任教授來通校兼課的如胡思齊、王載、劉鈞、王承祐幾位，為了逃難，也都辭退了川大職務，隨通校來台灣，所以在師資方面，還相當整齊，我曾經這樣想過，學校以師資最為重要，有了良好的師資，一定可以把學校辦好，這就好比一個戲院一樣，戲院裏有出色的演員，定可招攬觀眾，使戲院客滿座無虛席，生意茂盛，我因為要強調教官對學校的重要性，提高教官地位和職責，親自擬訂了一篇教育信條，呼籲大家信守，作為共同努力的目標，教育信條開章名義第一條就是「尊師重道」因此全體教師們都能忠心耿耿，羣策羣力，殫精竭慮，合作無間，夜以繼日地工作，在短短一年期間，把一堆經過轟炸後的廢墟，建設成一所興盛的學校，無論在教材課程，操作技術，圖書設備，學術風氣，在在都獲得相當充實和改進，特別是雷達訓練，那時台灣還沒有其他類似訓練場所，我鑒于海島防空訓練的重要，對於這種特殊訓練，要求更為嚴格認真，學員生的素質與技術，考核嚴格，決不可濫竽充數，為了執行認真，有一次

總部派了一批技術不合格的學員來校受訓，經過測驗後程度過低，我硬把他們送回，拒絕施予訓練，以致大大的得罪了當時總部訓練署長張之珍。

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元旦，國軍首次倡導克難運動，通校全體師生更是堅苦奮鬥，努力研究創造，八期正科畢業生胡嘯虎、梁浩源，留校任助教，研製無線電操縱汽車成功，膺選首屆克難英雄殊榮。

隊職官兼教官制度

除在技術教學上銳意革新改進外，在生活管理上，我覺得學生隊的隊職官和訓育官，因為不是通信兵科出身，技能學識，利害休戚，和學生相當隔閡，因此與學生在情感上，不太容易融洽，難免格格不入，不易和學生打成一片，而且他們工作也不够積極，管訓方法和作法殊嫌老舊，觀念亦落伍，不能跟時代改進，更沒有創意和啓發作用，空軍官校實行管教合一制度有年，隊職官兼教官，帶學生飛行，和學生水乳交融，情感調協，所以我第一步，決定仿照空軍官校，實行管教合一制度，遴選一批通校前期畢業生，技術學能和軍事訓練優秀的教官和助教，擔任學生隊長或區隊長，和學生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操練在一起，即使在晚上自修也在一起，并計劃更進一步，由通信技術教官，擔任訓育人員，實施管教訓合一制度。後者因我不久離校，就沒有實施。在實施管教合一開始，同時我又提倡學生自治，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隊職官僅在旁輔導和監督，自治會每週禮拜六夜晚舉行檢討會一次，自我批評，相互批評，因此學生

榮譽感責任心，也無形中提高，違紀犯規的逐漸減少，自重自愛，自立自強，蔚為風氣，學生自治試行不久，校長和教育處副處長金懌敦兩位，從台北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三期受訓結業返回通校，告訴我他們在實踐院受訓時的民主作風和自治制度如何的良好，有效，待他們知道通校也正在實行學生自治時，甚表驚異。

苦學上進的張瑞夫

我每天早晨黎明由家裏去學校參加升旗，途中時常遇見初級班一位畢業見習軍士張威林（後改名張瑞夫），背着一個書包，匆匆朝着火車站方向趕路，好幾次以後，經我問他，才知道他考取了台南工學院（後改稱成功大學）每天瞞着學校私下裏去台南上課，我覺得初級班學生有這樣一個上進機會，爲了造就人才，應該設法成全鼓勵，于是就特准他白天去台南工學院，晚間回到學校派他在電影教室做點放映電影和幻燈的工作，此外還有很多初級班留校服務軍士同學，向學心切，奮發自修，冀圖上進，我爲使他們有更多讀書機會，特訂定一個軍士旁聽正科班課程進修辦法，准許他們在本身工作之餘，到正科班選課旁聽，由于這一個辦法的實施，日後初級班畢業學生，在服役期滿，考取三軍軍官學校和民間大學的，大有人在，最傑出的要算張瑞夫，他在台南工學院電機系畢業後，離開了空軍，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考取了留學美國李國欽氏獎學金，獲得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博士，在美國貝爾電話公司擔任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二年把妻女楊雪梅、張媽國接去美國，我又和她們辦理出國手續并作保

人，一九六二年由聯合國派遣回台，在新竹交通大學擔任講座教授一年，家眷也來台灣，他在交大對於電晶體製造，貢獻很大。其次我國駐韓總領事方廷榴，師範大學講師崔之安，都是通校初級班傑出人物。

韓國李南英的故事

高級班正科班傑出人物自亦不少，台灣三家電視公司技術部負責人台視畢業家湘是高級班畢業，華視胡嘯虎畢業正科班八期，美商在台各電子加工廠，中山科學院，通校畢業生更不計其數，在美國加拿大電子部門工作的或自創天下的，也不乏人，就中以正科五期生李南英，較爲突出，值得一記述，李生係韓國人，寄居東三省，在通校五正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對超短波無線電頗有心得，教學熱心，爲人謙和有禮，他說着一口道地東北話，在通校期間，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原籍韓國，來到台灣以後，他時常請假由岡山去台北，起初我很懷疑他行動，以爲可能結交了不良份子或與異黨在外作不軌活動，有一次他又要我請假去台北，我沒有批准，當晚他來到我家裏，坦白地告訴我他的身世，說他是韓國人，父親從前當過韓國監察院長，日本亡韓後，逃難到中國東北，在北京出生，讀過南京中央大學附中，畢業後考入通校，因爲怕人家辱罵韓國亡國之痛，所以在註冊表上登記爲奉天瀋陽人，現在韓國已經獨立，他又和前駐華總領事閔石麟的女兒訂了婚，預備辭職返回祖國，可是學校一切文件上登載他的籍貫并非韓國人，在公文上辦理層層困難，一關一關無法解釋或證明，我對於他的處境

當然非常同情，乃建議他應由閩前總領事長直接函告空軍周總司令說明事情，由周總司令交辦下來，由上而下，比由通校一層一層的向上呈報，迅速而有效，果然他照着這樣做，很順利很快就回韓國去了，至卅九年（一九五〇）南北韓戰爭爆發，他以優異通信技術，對韓國空軍建立不少功績，遞升到空軍通信局長，并兩度和韓國空軍參謀總長張德昌和金信兩將軍訪問台灣，蒙蔣總統召見，慰勉備至，退役後轉業韓國電力公司公差來台灣時也曾和我會過，他和張瑞夫兩人，因感于在校我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成全他們志願以後，對我總以恩師相稱，我亦以鼓勵後進，獎掖人才，衷心也至感愉快。

公務繁忙家務艱困

我在通校工作極忙，沒有時間照顧家，家務完全靠玉玲處理，祖孫三代八口之家，薪水不夠用，生活苦到極點，玉玲每天拂曉，就騎着自行車去新生社農場趕着排隊購買些廉價的菜蔬，家裏養了幾十隻來亨洋雞，配製食料，清潔雞場，一天從早到晚，忙個不休，四女強英到岡山後不服水土，患肺門擴大，發燒咳嗽半年，玉玲日夜照料，晚間不得睡眠，強兒又患盲腸炎，開刀住院，兒多母苦，弄得自己骨瘦如柴，身體相當的壞，結婚以來，以這段期間，最為艱苦。

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十月，我奉派參加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八期受訓，這是大陸淪陷後來到台灣訓練黨政軍革命幹部的高級訓練機構，于上年十月成立，由蔣總統親自領導，自兼院長，院裏的課程，多是一些檢討大陸失敗的經驗和

教訓，和研究當前的國際問題與政府重要施政方針和國策，以及歷年來總統對革命理論的訓示，訓練時間為一個月，研究方式以小組討論為主，并以如何恢復革命精神重振國魂完成第三革命任務堅定革命建國信心為重要課題，受訓學員，都是來自政府各級機關中上級幹部，平均年齡四十四歲以上，雖然都是國民黨員，對於革命理論講的條條是道，滔滔不絕一大套，振筆疾書，動輒萬言，洋洋大觀，可是對於革命實踐力行，究竟能够做到多少，有多少績效！這便要看各人的素養志節如何，有的人說的天花亂墜，說是一套，做又是一套，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名為革命幹部，實則官僚腐化，有的人埋頭苦幹，腳踏實地，實踐力行，所以說四十歲以上的人，思想已經定了型，論語所謂「四十而不惑」，要談革命唯有靠青年，青年才有血氣有勇氣，有志向，有抱負，肯犧牲，肯吃苦，肯奮鬥，過去我曾參觀過若干次國父孫中山革命史蹟館，每次我都深深懷着同樣的感觸，那些革命先烈的相片，除了革命導師國父年齡稍長以外，其餘都是些熱血青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沒有有一位年齡在卅歲以上的，當然這所革命實踐研究院，歷屆訓練那麼許多人，也產生了若干預期的效果，尤其院長苦心孤詣，期望殷切，終身為革命事業奮鬥，使我頗受感動。

通校學籍納入正軌

我從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完畢，返回通信學校覺得空軍通信，在過去派系紛歧，大家來自各個不同的軍種兵種，不同學校出身，在工作上難免互相掣肘，不容易做到和衷共濟與精誠合作，

尤其通信學校和通校前身通信人員訓練班學生，兩系格格不入，對立很久，摩擦時生，在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通校改組擴編的時候，沒有把通信人員訓練班畢業學生追認學籍，這一批學生，原為空軍通信中堅幹部，在工作崗位上，犧牲奮鬥，隨飛機作戰，出生入死，成功成仁，曾有不少卓越表現，可是出身于空軍訓練班，竟因母班擴大組織變更為通校，反被排斥於校外，這是當時一件欠考慮不合理的錯誤行政措施，多年來總部人事主管部門，雖然明知問題存在，但因循敷衍，蕭規曹隨，拘泥墨守，無人肯打破現實，去把問題解決，這樣長期演變下去對今後通信發展，在人事糾紛上，徒增困難，影響殊深，因此我就建議一個統一學籍方案，條陳利弊得失，呈報到總部，把前通信人員訓練班已畢業一到五期，追認為通信學校一期一班，二期二班，三期三班，一期四班，一期五班，而把通校正科班一期畢業生，改稱一期六班，正科二期以後，期別序次不變，這樣在期別名稱資歷上，通信學校一期畢業學生並沒有吃虧，而通信人員訓練班各期畢業生却都能納入通校統一學籍系統，同時我又進一步擬訂一個調訓計劃，把全軍所有非空軍訓練出身的通信人員，分批輪流調到通校復訓，畢業後取得通校學籍，這樣在一個空軍通信大家庭旗幟之下，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統一學籍，在人事業務上，將益增團結，互助合作，共圖發展，我這一個統一學籍方案，終于獲得總部批准，以後對於空軍通信發展進步，的確具有深遠重大的影響。